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一三期 ——
(二〇一三年十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310a)

【研究报告】	文革，其实没理论	顾 土
【亡灵祭坛】	沈达力之死——记述一个人性泯灭的故事	多思堂主人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二）	孙怒涛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上）	孙 耘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文革，其实没理论

• 顾 土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次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其中称，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尽管毛泽东在历史上特别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在文革中，学习理论、掌握理论，被置于空前的位置，中共九大和十大产生的政治局内，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位被称为理论家、笔杆子的人物显赫一时，而中央文革小组更是由以理论水平著称的人为骨干。文革中所说的理论，既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1年初，批陈整风运动掀起，陈伯达这位中共党内的著名理论家被当作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遭到猛烈批判。3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文稿时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

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加上两报一刊的不断推动，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直至文革结束，理论学习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学习小组也遍布各地各单位，连初中学生都不例外，各类马列著作单行本和学习辅导资料以及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理论学习文本成为书店的基本内容。我就是读中学时作为课外理论学习小组成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那些著名著述，只有一部《资本论》和斯大林的大部头著作没有被要求外，其他大多成为必读。但斯大林的大部头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在1950年代还是必读的教科书。

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很重视理论，尤其宣传部门，还有专门的理论局、理论处，用来指导全党全国的理论建设，将理论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思维特性也不同，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表面上重视理论，其实却缺乏理论素质，出现了泛理论化倾向，也就是说，没有理论、硬充理论，于是将什么都当作理论。正是这种泛理论化，最终导致了理论的庸俗化、低质化，让理论变得不再是理论。

◇ 理论和理性实际是民族的弱项

一种理论的形成，架构、思辨、推论，是免不了的，其中最需要的是抽象的提炼和升华，而且，作为理论家，用属于自己的文字，条分缕析，全面系统阐释自己的理论，也是必需的。

在欧美国家，理论与理论家一直层出不穷，仅社会主义阵营里，理论家就有一大批，丰富的理论修养、独到的理论建树和大部头的理论作品是他们的特征。从俄罗斯到苏联，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布哈林，个个著作等身，而且都以专门的理论著作见长；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无论纯粹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是进行过具体实践的革命家、政治家，其全集都是十几卷、几十卷之多。欧洲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许多理论家，尽管他们的理论基础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框架内，但都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拥有独到的理论建树和思想见解，并且形成了专门的理论著述，罗莎·卢森堡、葛兰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均是如此，而在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古往今来并不少见，但理论家却寥寥无几，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中、中国共产党内，谁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家呢？康生生前一直有理论家之名，死后的讣告中仍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终其一生究竟写过哪些理论文章，拥有哪些理论建树，至今不明。陈伯达也被称作理论家，他的《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论著名气很大，但这些著述只是些适应政治需要的批判文字，缺少思想的独到性、思辨的严谨性、理论应有的抽象性，也没有系统性，与他后来的那些社论文字一样，放在报章上倒也不失气势和焰，称政论更合适一些，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理论范畴。胡乔木逝世时，讣告也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其实，与陈伯达一样，叫政论家、笔杆子、文人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也可以称其为领导或散文家，以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字大多缺少理论作品所应有的那种独自推演出来的概念和原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这样的文字，虽说也是在阐释理论，但只不过是任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谈不上什么创建。这样的文字虽然也可以叫理论文章，但仅靠这些文字，作者也实在难以被称为理论家。只有张闻天晚年经过深沉思考写出的“肇庆文稿”，理论探讨的色彩还算稍浓一些。当然，顾准生前未发表的很多文章应该属于理论文字，说他是理论家还比较合乎情理。

在中共历史上，其实并不乏思想家，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对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但思想家与理论家之间既有关联也有区分。

如果说有思想，估计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有思想，其中，有文化有个性的人，其思想则

会更多一些，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仅仅属于自己，无法影响社会，唯有政治家、理论家、作家的思想才有可能广为人知。政治家依靠政治实践将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无论成功与否，都让社会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结果。作家，包括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政论家、艺术家、报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哲学、史学、科学、政论文字宣扬自己的思想，一旦被传播，就会引起别人直至社会的注意。而理论家则是依赖自己的理论著述来表达思想的，其著述不是散文、随笔，也不是社评、而是理论色彩鲜明的文字，思想创建只有化做理论阐释才能转为理论创造。所以，很多思想家、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未必就是理论家，但理论家却可以同时兼为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甚至艺术家。尤其是，理论家基本都是思想家，否则，其理论建树也就无从说起了。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或许都写过理论文字，但如果要成为理论家，其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因为丰厚的理论著述、独特的理论建树，是理论家的基本。

中共领导人，凡是有幸能够出版选集或全集的，充其量不过五六卷而已，大多还以谈话、报告为主，所以不应该叫著作，也不算文章；其中算得上文字的，有不少也属于批示、书信、电稿；有些讲话可以转化为文字，但讲话受时间所限，也不能太长。所以，中共领导人的长篇大论几近于无。这与苏联形成鲜明对照，仅列宁全集就多达60来卷，斯大林也有10多卷，虽说也包含讲话、书信，但扎扎实实的宏篇巨作还是占据主导位置的。革命、建设的繁重任务使领导人无暇写作，这并不能成为理论著述稀缺的理由，因为斯大林的许多重要著述恰恰产生于十月革命以后。

中国人不擅长理论构建、理论解读、理论分析，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理论的接受能力，缺乏理论的头脑，这是延续数千年的历史现象。所以，中国历代思想的社会传授靠的不是文章，而是语录，伦理规范倚赖的则是警句，文化推行的载体则是格言，“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用精炼、生动、押韵的语句和典型事例阐明要义，通过半诗半顺口溜般的传播形式而深入人心，以致最终形成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规范。林彪等人深得其中要领，在他们的授意下，原本就不长的领袖文章被再加提炼，让一段段简洁且易记的语录，作为理论的替身，直接灌输给亿万人，其间还夹杂着歌曲、顺口溜等各类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说，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积极参与、对领袖个人迷信的极端认同、对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刻骨痛恨，都不是接受理论的结果，也非说理后的信服，而是这些语录极具冲击力，富有动感，简单明了，易于背诵。无论其逻辑如何，是否有悖常理，也无论其是否只是一句废话，毫无思想价值，一旦带有了圣谕性质，一经强力的传播、反复记忆，在其他一切思想、文化、观点完全处于荒漠的情形下，自然就变成了唯一有价值的思想、唯一有意义的观念、唯一有说服力的语言、唯一有文化意味的表述方式、唯一有共识的经典。“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话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这一段著名话语形象表现了那个时代语录在思想传播中的核心位置，而那个时代各类英模学习毛著的情形也表明，他们的学习基本都是摘抄语录、背诵语录、体味语录，没有什么人是由于学习了理论才信奉了领袖，才信从了领袖的思想，相反，真正学习了理论、掌握了理论的人，如顾准、遇罗克等，却怀疑直至反对领袖思想和文革了。

理论的基础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恰恰又是我们民族的弱项；理论离不开形式逻辑的推演，而形式逻辑也不是中国人的长项。在这样一个缺乏理性思维和形式逻辑的环境里，理论却被捧上了天，尤其在文革里，人人都在那里学习理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和学习小组遍地开花，报刊文章介绍宣传理论的文字更是大泛滥。如此的结果，可以让文盲、半文盲和逻辑思维不强的人在所谓的理论文章面前处于被教育、被灌输的位置。尽管最终他们也没弄懂什么是理

论，但却可以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起码他们会被教育者、灌输者的理论面具所唬住，信服理论号召者、宣教者的说法，认定这些人才是马列主义者。而且，理论还可以作为打击异己的武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以“主义”和“论”为名的帽子满天飞，经济主义、修正主义、卖国主义、唯生产力论、唯心论，谁被扣上这些帽子，就意味着被打倒，而标榜自己时，基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所有这些判断和定论并非出自理论的探讨，都是先依据领袖一句定性的话，然后再由报刊用大批判式的文字、借着理论之名加以定罪。然而，领袖凭什么就是马列主义呢，又凭什么被他批判的人就一定是反马列主义呢？在那个年代，多数人都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领袖就是马列主义和真理的化身，他的说法天生就属于马列主义理论。至于那些极少数抱有疑问的人，其论辩不但根本不可能见天日，持论者还可能被投入监狱，直至处死，罪名叫做“恶攻”。

文革和文革前，马列主义是绝对正确的主义，但世界上对马列主义的解释却有多种多样，在国际马列主义阵营内也有各类政治家和思想家。为了证明只有自己所说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而赫鲁晓夫、陶里亚蒂、多列士、宫本显治、刘少奇、陈伯达所说所用的马列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所以，理论阐释就显得至关重要，无论对内对外，借助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马列主义的正宗传人，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形式，从“九评”一直到批刘、批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的马列主义理论阐释文字占有重要分量。在这种阐释中，“一言堂”是关键，没有选择，没有争鸣，正确是天然的。尚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他在1950年代就遭受批判，因为他阐释的历史学与钦定的有所不同；孟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者、《资本论》的专家，但他却身陷牢狱，被处以重刑，因为他的理论阐释与时论迥异。诸如他们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处境艰难，可见，那时理论阐释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马列主义，而是为了让马列主义在中国成为“一言堂”，为极端的个人威权服务。刘少奇、陈伯达就更能说明问题，这两位曾经代表所谓的马列主义去讨伐外国的修正主义，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被定成了修正主义，因为相对更高的威权而言，他们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工具罢了。

◇ 1957年以后，毛泽东没有文章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以“两报一刊”编辑部名义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章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但总结了正面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反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也加以归纳，一、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要把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这篇文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说得言之凿凿，还称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那个，总结了那个，但毛泽东这一理论和这些系统总结出自哪里？是在哪篇文章里阐述的，体现在哪

些著作中呢？还是这些文字至今仍秘不示人？除了1957年那篇被张春桥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外，找不到一篇。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出自毛泽东这一著述，其实也不准确，因为由毛泽东的讲话整理加工而成的这篇文章，其中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恰恰是在公开发表前为了刚刚开始的反右运动而特意加进去的，并且从通篇来看，此文也与文革的指导思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假如真的能坚持文中的观点，文革那种横扫一切的方式就不会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必那么残酷那么无情。

毛泽东是政治家、思想家，毋庸置疑，但他不是理论家，在他生前那么多“最最最”的顶级桂冠中从来也没有一项是理论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大大小小的信徒，都没有将他归入理论家的行列。正因为毛泽东不是理论家，所以，在他一生不多的著述中，理论文字也很少。1949年之后，尽管资料查询、图书阅览、写作环境都极大改善，要服务有服务，要地方有地方，但毛泽东的著述，尤其是理论文字却更为稀缺。到了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紧锣密鼓，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思想、阶级斗争学说形成的关键时期，亟需要毛泽东的文章对全国加以指导，可是，整整19年，不但理论文字阙如，就连他的亲笔文章都几近绝迹，只有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算是一篇超短文，还是用铅笔写在北京日报的边角上。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此文既类似于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黑板报文字，短小精悍、活力猛烈、上纲上线；也是文革大批判文章的最佳范文：打棍子、扣帽子，自我绝对正确、对方肯定反动，无所不用其极，丝毫没有商量探讨的余地。可这样的文字如果不是出自毛泽东笔下，恐怕在报刊上是很难问世的，因为充其量这不过是个“编者按”，或是读者来信摘编，根本不属于文章。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将这当作一篇文章，否则就不会随随便便使用铅笔写在废报纸的边角了，除非他是以极为轻慢的态度来对待一场涉及全国男女老少、殃及千百万家庭、让中华历史文化遭遇重创的浩大运动。不过，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不成样子、兴之所致的东西却刊登在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成为文革期间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如此情形，古之帝王也望尘莫及，清朝皇帝的朱批，起码还写在了规范、正式文本的边沿，并且是规规矩矩的书法。

既然1957年以后没有著述，也不见理论文字，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何而来呢？在当代中国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理论的全面阐述和最终的文字形成并不来自理论的挂名创建者，而来自写作班子。写作班子里面的执笔者在中共历史上称秀才或笔杆子，领衔写作或最后文字定稿的则叫大秀才、大笔杆子。有些大笔杆子因为地位上升，直至进入中枢机构，主管意识形态，所以还能负责审定各类重要文稿。这些大秀才们主持或授意下发表的文章，除了少量由自己署名或亲自执笔外，多数都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名义出现，有的文字则让各类写作班子起草，最后自己定稿。到了文革，为领袖指示和阶级斗争的新运动进行诠释、鼓动的写作班子遍布各行各业各级党政机关，大批判组和著名的写作班子成为文革的一大风景。他们有专门的空间，还可以租住招待所甚至宾馆，大秀才及其为他们服务的“中央级”写作班子还可以长期住在国宾馆里，包几座小楼，享受着超出高级干部甚或中央领导人的特殊待遇，在知识分子饱受压抑和摧残的年代，他们的身份和优渥的待遇，更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

康生、陈伯达等人，有的署名写出的文章还远不如毛泽东的多，却能被冠以理论家的头衔，正因为他们都曾经领导、主持过中央的写作班子，负责授意、审定过重要报刊的著名文章，主管过意识形态，用他们的文字功底、理论水平、政治知识和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功力，为领袖的各类简短指示拼接成所谓的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是一些理论观点的直接阐释者和创造者。

文革从头至尾都有一批大笔杆子或叫大秀才处在政治的核心地带，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文字功底、理论知识、思辨能力，曾经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或者负责宣传文化，正是他们的主持、起草和审定，才将领袖的片言只语扩充为理论，才让文革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理论的声音。如果说文革还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可以被说成为一种理论，那他们的确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文章，没有他们主持下起草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没有他们主管的各类写作班子的文章，文革中就不会有任何理论文字问世。然而，这些人中的多数人又在文革里不断被替换，被替换的人还都逃脱不了被打倒、被关押的命运，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除了康、江、张、姚外，毛泽东时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这些人倒台后，由他们署名、他们负责起草的各类重要文章也不再被提及，甚至还可能作为罪状受到猛烈批判。翻阅文革的各类重要文章，你会发现，林彪事件以后基本不再提及此前的理论文章，文革后期也不再引用前期理论文章的多数观点，而是改用新的提法、新的观念。由此可见，许多笔杆子或秀才们依据领袖指示所创造的那些论点只不过是文革之间某一个时期的思想点缀，昙花一现，他们努力为毛泽东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变化多端，从来就没有定型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提法外，都是些时效性极强的没有被最终认定的说辞。而且，整个文革中，连一篇像样的全面阐释这一理论的文章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以说，只是说法，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

◇ 张春桥、姚文元，文革理论的写作高手

文革前期，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前，报章的文字大都是语录加大批判，疯狂的个人崇拜、猛烈的攻击炮火、极端的定性词汇、情绪化的叙述风格，是其写作特点，带有理论色彩的文章不多。林彪事件后，由于社会趋于稳定、该清除的对象都已经扫荡一净，加上庐山事件后，毛泽东对理论阐述日益重视，使得文革后期的各类报刊上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学用理论的氛围日渐浓郁、情绪化的大批判文字相对减弱。而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将毛泽东的新指示作为理论论述的核心，摘用的所有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语言其实都是为毛泽东指示服务的，借此显示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继承人，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只是因为毛泽东的话总是过于简短，所以在文章中显得马列的文字更为厚实。

文革后期大小政治运动数量并不亚于前期，从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评《水浒》、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击右倾反案风，但这些运动都由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以及各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得到了严格的控制，更多地倚赖于文字和语言的批判，体现在报刊、广播、大字报、黑板报、批判会上，其中由全国知名写作组写出的文章，学马列、讲理论，也是基本内容。1971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社论时的那段著名批示传达后，学习理论、强调理论、运用理论成为全国的风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也成为永久性号召。但谁都清楚，用毛泽东思想可能也可以，而用马列主义则根本不可能，不用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即使是极少数高级干部也很难做到，大多数人不过是跟着报刊和学习材料上的解说转悠罢了。因为学马列主义理论并不是小学识字，也不是读《论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仅凭那些语录足够了，就算读原作也不难，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就要读懂马列原著，这是个令多数人头疼的问题。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十分清楚，“我党懂马列的人不多。”而真正懂马列的人，也未必能与毛泽东的思想相一致，所以，所谓马列原著，不

过都是些符合毛泽东的治党理政意图的摘抄而已。这一做法，后来一直顽强延续，马列理论实际上已成了一种证明自己施政措施合理合法的语录汇编。

文革中没有一篇全面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毛泽东在整个文革中也没有一篇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出现，那些社论、评论员文章、写作组文字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经不起文革发展的考验，因此，到了文革后期，通过理论层面解读、总结、肯定文革，用文革思想积淀和马列理论阐释为文革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以马列主义加毛泽东指示打造、充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已成为迫切需要。

1975年，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这是文革的两篇纲领性文章，也是整个文革中最具思想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授意并完全认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字，可谓文革思想发展史的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有的媒体想要批判这两篇文章，被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制止，“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可见贴近毛泽东的汪东兴深知这两篇文章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后，汪东兴的制止并未见效，因为不彻底批判这两篇文章，中国社会就不可能真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尤其张春桥，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理论家、写作高手，政治地位一再上升，可谓炙手可热，直至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深得信任，而其他理论家、笔杆子在文革10年中不是被淘汰就是被打倒或被投入牢狱。张春桥同时兼具党政军的要职，在中共历史上，除了第一号人物、接班人外加邓小平外，只有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甚至超过了江青、王洪文。从1958年10月《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被毛泽东赏识后，张春桥的文字和思想始终得到毛泽东高度赞赏，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毛对陈、吴、邱、李、叶的鲜明态度更表现出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宠爱有加。与姚文元的文字相比，张春桥的文章，包括《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显得更具理论性，而且说理多于火药味浓烈的大批判。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详细阐释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虽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建构而言，这两篇文字尚嫌单薄，还不足以撑起一种系统的理论，但却不失为建设这一理论的最有质量最有分量的文章。张春桥和姚文元深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实质，特别是张春桥，更是得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衣钵的嫡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梳理得一清二楚，说得严谨扎实，无论逻辑还是文字，水平都不低。

毛泽东发动和发展文革，其实是由多种原因交织形成的，帝王的独裁意识、专制体制的结果、暴力革命的崇拜、群众运动的情结、现代生活方式的反动、阶级斗争思想的主导、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烈追求，每种对文革诞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合力。如果仅仅清洗异己，或者打击知识分子，或是镇压地富反坏资本家，只需使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使用的那种批判，抑或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运动中的一项，足矣，但文革却集各种运动之大成，将全国所有人都牵连其内，既有清洗、镇压式的残酷，又不失运动式的洗脑，不但对一部分人从肉体上进行处置，还要对任何人进行彻底的思想洗涤，既有最上端的绝对控制，又有群众自发的狂热举动；在打倒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同时，还要对各地方最小单位的负责人加以批斗；在激烈批斗党内走资派的同时，对全社会所有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和有“现行问题”的人，也绝不“心慈手软”；攻击刘少奇、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对付党内资产阶级，还要扯出赫鲁晓夫、孔子、儒家、《水浒》，可谓中外交相推进，互为依托，几乎来了个古今中外大清盘。这些，仅仅用一两个原因和动机，恐怕不足以表露文革发动和发展的真相。

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文革的理论依据，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文章里得到最为清晰的归纳和阐述。这并非来自毛泽东的理论著述和个人文字，而是简短的几个指示，这些指示在两位笔杆子的精心注释和充分发挥下，与马列主义一些论断相衔接，与毛泽东过去的文章论点相对接，终于成为文革的纲领性理论文献。

张姚两篇文章所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几段指示，真切表明了毛泽东发动并发展文革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说法中最具思想分量和理论意义的言论。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基于毛泽东对全国的这一认识，才有了全国各阶层参与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对象实际是所有人，有的可能从人身上加以消灭或管制，有的则从思想上进行不间断地清理，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依然随时随地都可能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论断和张姚的阐释是否正确，走什么样的道路更合乎中国国情，都可以讨论，但毛泽东的晚年不得不承认商品制度、工资制度、小生产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还需要保留，只是必须加以限制，限制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和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最佳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当然也包括不断进行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其实，取消商品经济、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工资制度，一夜之间消灭了三大差别的革命实践不是没有，中国曾经全力支持、倾力支援的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就实现了这一情景，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他们算是彻底的革命派，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进军共产主义的典范，人民日报曾经激情洋溢地称赞了他们的革命果实。中国农民的代表陈永贵，当年以中国领导人的身份与波尔布特一起在柬埔寨农业生产第一线热情劳动的场面，曾经感染了多少人。但这个政权及其统治却是短命的，而且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不同的是，这种残忍对付的是柬埔寨国内各阶层的人民，是对自己的人民发动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

如果研究文革，解读文革思想，分析文革理论观点，就必须认真研读《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是经过多年的文革实践，在思想积淀、理论梳理后的文革总结，表达了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核心，表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号召的理论探索轨迹，说这就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亦无可。

□ 原载《共识网》

~~~~~

## 【亡灵祭坛】

沈达力之死——记述一个人性泯灭的故事

• 多思堂主人 •

散文家周国平在2004年7月出版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一书中，动情地描述了他1962年夏末考取北京大学后，从上海到北大报到时，在列车上不期遇到的这样一个女生：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这位漂亮的女生，就是在燕园的湖畔自杀的沈达力。

沈达力之死，是对那段人性泯灭的历史和泯灭人性的人们悲惨的控诉。

周国平说：“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反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

两年后，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我从沈阳来到北京，也这样跳上了北大接新生的车，不过不是卡车，而是一辆大客车。

又过了两年，我和这位女生一起卷进了旋涡，不期而遇了。我们在燕园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分别代表红卫兵组织先后发言。很快，我成为攻击文革发难者的“反革命分子”，被多次批斗；她成了文革祭坛上一只羔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饮恨自尽在她喜爱的湖畔。

整整40年过去了，每想起那些昏天黑地的日子，心里都刀割般地痛。

1967年3月12日，沈达力最后一次从上海的家中走出来，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因为批评了北大的老佛爷聂元梓，她是被老佛爷的爪牙勒令回到学校“认罪”的。她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但是她非常害怕，也许她已经预感到什么，她在家里做了准备。

她在火车上反复观看着从家里带来的一本像册。这是一本崭新的像册，上面没有别人的照片，而是全部新买的毛主席的照片。她在家一张张精心地装好了，心里想着，“如果我回去，被打成反革命，我想念毛主席，要天天看毛主席的相片。”，不过，她也存在着一点希望，希望朝夕相伴了4年的同学给她留下一条生路。她暗下决心：“我不能因为犯错误而灰溜溜的，要勇敢地爬起来。”

火车铿锵有力地在夜色中行进。她的心却不时紧缩成一团，痛苦地在茫茫夜色中挣扎。她放下了像册，把认真收集的、在两个手绢上别满的毛主席像章拿出来看，一个个抚摩了几遍，又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衣服口袋。在上海车站上车前，她还买了几张印制精良的毛主席诗词《长征》、《咏梅》等，不过下火车时，她又不安起来，把这几张诗词送给了同车的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她害怕回到学校，回到那间令人恐怖的宿舍，同学们看到会说她是“负隅顽抗”了。

她当然一直都没有合眼，再不像几年前的那一个夜晚，她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到学校报到时，列车上她不断靠在一个腼腆的陌生男孩子的肩上打瞌睡。

12日夜里11点多钟，沈达力回到了学校。

掌握大权的“班文革”早已得知她要回来了，3月11日就开始认真策划和准备对她的批

判会。先是召开了全班的“揭发动员会”，接着布置其他各班配合行动的办法。几乎每个同学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揭发批判的大字报。从11日晚上到12日白天，全楼道里无处不贴满了关于沈达力“罪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从一楼直贴上三楼的楼梯，从男生宿舍一直贴到女生宿舍，一直贴到她的门上。宿舍门的正面，是赫然醒目的《警告》，旁边是一些标语，包括：“闻名全校的母老虎”、“母夜叉沈达力”、“？沈达力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沈达力不投降是死路一条！”“沈达力必须低头认罪！”等等。几个女同学还在她的床头贴上一条毛主席语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定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这是何等萧杀的气氛！

她浑身颤抖地看着这一切。她的精神防线已经崩溃了。

沈达力，不仅美丽，而且文雅。但她毕竟是一个天真善良，又有些懦弱的女孩，她是与所有女孩子一样很爱面子，也颇自尊的人。她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狂风恶浪！

掀起这股风浪的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

推波助澜的人，是一些曾和她同窗学习，友好相处的女同学。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但是，革命的女人，难道就必须充满仇恨？

也许有人是残留着人性的。在沈达力回到宿舍的那一刻，宿舍里没有人。靠近窗户的方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到：“根据现在的揭发材料，我对大家的认识老是跟不上。我认为沈达力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这是她的同学江蓝生写的。江蓝生本打算把这个想法写成大字报张贴出去。后来只是写成小字报贴到了男生宿舍了。沈达力看到了这张底稿，心里十分紧张，不知道她们会把自己定成什么性质的问题。如果是“敌我矛盾”，那么问题就严重了。就真的“死路一条”了。

3月13日清晨，她很早就起床了，这个爱干净的女孩没洗脸就开始抄写在上海家中起草的大字报《我的检查》，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外面。早饭后，她被叫到中文系男生居住的32楼看人们给她贴的各种大字报。与此同时，班里开始了“天天读”，“班文革”对尚有同情心的江蓝生说，“你得去把你的小字报摘下来，不能让沈达力知道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江蓝生就赶紧跑到那边把小字报撕了下来。“天天读”结束时，大家齐唱了语录歌：“人民靠我们去组织，……”和“凡是错误的思想，……”。散会后，“班文革”的一位领导小组成员找沈达力谈话，对她进一步施加了压力。

当晚，沈达力在全班的会议上做了第一次检查。她眼含泪水念完了自己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同学们则进行准备好的批判。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她是“避重就轻”、“投机成性”、“蒙混过关”。结论是：“请罪没有诚意，再往下滑是危险的！”

她当时还不知道，“班文革”早已经给她定下了“五大罪状”：

1、“反对中央文革”——听说中央文革已经对北大的问题表态，校文革确定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沈达力却说“中央可能不了解情况，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她对中央文革是不信任的，对中央文革是有不满情绪的。在全校的大会上，她代表“红联军”发言，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校文革就是校文革。”这是公开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挑拨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2、“和反革命的边缘人物有边缘关系”——沈达力和“红联军”的头目、“反革命分子”俞启义、张志握、赵丰田（均是哲学系学生）密切往来。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竟然说他们“也不一定是反革命。”

3、“顽固反聂”——沈达力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红联军”，属于中文系的“猛虎团”，知道中央文革支持聂元梓后，还有些想不通，不知悔改，是一个“女干将”。

4、“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沈达力的父亲曾在美国旧金山留学，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对父亲十分崇拜，关系十分密切，可见她“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5、“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沈达力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阶级烙印很深，个人主义和名利思想比较严重，经常爱出风头。

这些罪状，是足以置她于死地的。因为她不仅有“反动”的背景，“反动”的活动，而且她的矛头竟然对着“中央”！

3月14日，全校同学都被组织去参加“打倒谭震林”的游行了。她在宿舍里，一边哭，一边给母亲写信。中午，一个外校的老同学来找她，她痛苦地对那个同学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下午，回到学校的两个同班同学赵某和邹某以及北师大的同学孙某与她在校园里谈话。她们心情沉重地走到了西校门外的蔚秀园，虽然都很同情沈达力，但在那种恐怖的气氛下，谁也不敢说什么，只好让她认真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总结教训。

3月15日，她上午在宿舍里继续检查自己在几个月来的表现，因为下午她要在班里的批判会上进一步检查“罪行”。下午班级在各处张贴了海报，召开“沈达力问题串联会”。来了一些其他年级和其他班级的同学。串联会集中讨论三个问题：

- 1、沈达力曾经公开表示同意“红联军”赵丰田的“北大左派先天不足论”；
- 2、对中央文革认定“井冈山”和“红联军”是“反动组织”想不通；
- 3、对于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的人，认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要求沈达力交出她的“黑材料”。

晚上，“班文革”在沈达力宿舍的门外又贴出了一张《通令》，说她“犯下了滔天罪行”，逼迫她“立即交出全部黑材料。”深夜，她一个人在未名湖边转来转去，痛苦万分。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至半夜11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3月16日，上午全班同学都去听农业科学院一个人到北大做报告，暂时没有人理睬她。

下午，“班文革”带领一些同学聚集在她的宿舍，十分严肃地要她交出“黑材料”。这时，沈达力的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她茫然地把自己的衣箱书箱打开，把本本、信件之类全摊在地上。她蹲在地上，把东西一件件拿给她们看，边翻边问：“这个你们要吗？”“那个你们要吗？”她的双手哆嗦着，满脸通红，汗水直往下流。

班级里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的某同学感到沈达力仍然有“抵触情绪”，立刻跑到不在现场的“班文革”领导那里汇报，说“沈达力不老实，不愿意交材料！”这个人马上气势汹汹

地赶到宿舍，恶狠狠地训斥道：“你还有好多材料怎么不交？”并命令同学立刻“查抄”。所谓“查抄”，就是完全不顾她的人格尊严，把私人的一切抖搂在大家眼前。实际上，沈达力已经把一切“材料”都交出来了，包括前天即14日写的日记。

晚上，“班文革”领导亲自出马与沈达力“谈话”，没有人知道她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在14日的日记中，沈达力已经写出了不想活下去的意思。这个“班文革”领导到底与她说了什么呢？

17日上午，全体学习《解放军报》社论和《文汇报》社论，沈达力也参加了学习，表面看是平静的。下午全系在第二教学楼开批判大会，批判的是一个曾经追求过沈达力的男生。主席台上，一个人揪住这个人的头发，几个人使劲反拧住他的胳膊。没有人认真听发言，只听到被批斗者的一声声惨叫。

不知道批斗会什么时候结束的。全场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沈达力一个人木然地呆坐在那里。

晚上，人们就在“红湖”岸边发现了她服毒自杀的遗体。的确是自杀而不是“他杀”，因为在宿舍的书包里，人们发现了她写的《遗书》。

第二天大清早，一个尖利的声音在楼下大喊：“哎！——216的伙计们！你们知道吗？那个家伙死喽！”接着传来她的开心大笑。

宿舍里的女生们心情并没有她那么快乐。有人小声嘀咕：她这是报喜还是报忧？

当天，全系及时召开了大会，文革主任吕某说：“她的问题，死前是人民内部矛盾，死后就是敌我矛盾了！”

“班文革”决定：“立即召开声讨、揭发、批判大会，把她搞臭，肃清一切影响！开除团籍；把班里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一个女大学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在一场“革命风暴”中。

她的母亲和妹妹被通知来处理丧事。两个人忍痛含泪，悄悄来到燕园，在人们指指点点的恐惧气氛里，悄悄地把骨灰盒带回了上海。

后来，受邓朴方委托担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的赵丰田告诉我，沈达力的母亲和妹妹到北大后，没有居留之处，是他把这悲伤的母女安排在自己的女友、生物系同学宿舍里的。“反革命”今天健在，同情“反革命”的女孩子却香消玉殒了。她的冤魂，还在燕园周围飘荡么？

□ 原载《燕园风云录——北大文革回忆资料汇编》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二）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9 c，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6—1 9 6 8. 9））

第十一节 陶德坚和“红教联”，我倾力批判过

清华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在文革中的表现也非常活跃。他们组织了以教师为主的战斗组。其中有两个战斗组闻名全校，因为它们曾一时成为学校运动的焦点。

一个是由动农系的青年教师倪振伟为首的“二万五千里”。他们在1 9 6 7年初兵团总部整风的时候，因为批评总部的错误、反对否定“八八”招致总部的打压。总部的“二办”以“二万五千里”攻击总部为由通令解散该战斗组。更可笑的是总部以对待“二万五千里”的态度作为干部亮相的试金石。这一通令引起轩然大波。支持总部决定的与反对总部通令的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大多数战斗组发表声明认为总部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在“总部委员中仅孙怒涛一人不同意（解散）”。一个战斗组，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仅仅是因为对总部有不满意见，即使尖锐一点，也不能通令解散的嘛。可见当时总部在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上是多么的横蛮霸道！为此事，我曾找过住在校内招待所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把总部会议上各种不同意见向他反映，希望上面了解并阻止蒯大富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张广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连同我提交的材料装入一只大信封内，上书“戚本禹同志收”。“二万五千里”后来成为“4 1 4串联会”的发起战斗组之一，一直是4 1 4中非常活跃的教师战斗组。

另一个战斗组是由土建系的青年教师陶德坚为首的“红教联”。它是团派观点的。这次是轮到4 1 4对“红教联”倾力批判，大力打压了。在这个问题上，“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要批“红教联”？我对“红教联”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么两件事：一是他们提出了一个“现在的好人要从过去的坏人里面找”的口号；另一个是他们搞了为陈里宁8 7翻案的行动，影响很轰动。

现在已经无从知道“红教联”提的这个口号确实是出自他们之口还是4 1 4的一些战斗组把“红教联”大字报里的“素材”经过“概括”、“提炼”以后再加给他们的。在两派论战中，断章取义、添枝加叶、上纲上线等等手法是常用的，两派都有。所以，4 1 4对“红教联”的批判声讨中，肯定也会有许多不实的地方。但是，“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我们认为“红教联”的这个口号与团派的“大翻个儿”、“彻底砸烂”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为陈里宁翻案的行动则为此口号做了最好的注解。

4 1 4打压“红教联”还有一个原因是“红教联”的成分复杂。为首的陶德坚虽然是党员，但是在反右运动中犯了错误，受到过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一政治“污点”让她一下子从优质群体中除名，成了差质生。她是“红教联”的头头，这一条辫子，足以把她为陈里宁翻案的动机说成是对党不满、向党反攻。

“红教联”组织上是属于团派的，“红教联”观点上是属于团派思潮的。所以，无论是出于政治观点的不同，还是出于派性利益，4 1 4是必然要打压“红教联”的。批“红教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批团派。“红教联”只不过是一个把柄很多、极易击败的现成靶子。“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对“红教联”的看法高度一致，动员4 1 4力量，对“红教联”口诛笔伐，其声势达到铺天盖地的程度。而团派，用不着详说，当然是死保“红教联”的。

4 1 4在主楼前召开过“斗争反革命分子沈孝宇、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陶德坚的反动言

行大会”，这事我是赞同的。但是把陶德坚拉到会场上进行批斗，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赞成。

我现在认为，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政治观点，是客观存在的，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的碰撞、争论是必然的。在法治下的言论自由，就是人人有批评的权利，人人也有辩护的权利。摆事实讲道理的争鸣、批评甚至批判都是有助于社会进步，有助于彰显真理的。遗憾的是，文革年代缺乏这样的大环境，于是414与“红教联”之间的争斗，其实也是与414与团派的争斗一样，是既有正常的政治观点争辩，又交织着浓厚的派性色彩。

414在批斗中揭露“红教联”是“由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老讲师（占58%）、神仙和神仙太太（占63%）、舞女、流氓、贪污分子（占7%）”[4—P179]拼凑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成分让“红教联”更不堪一击。这使我想起来了我的“怒涛”战斗组曾被讥笑为“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怒涛”与“红教联”其实是“一路货色”，可是我这个“怒涛”的头头却在振振有词地严批“红教联”的头头！我当时觉得“红教联”就是该批，批得有理。在我的脑海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罪不可赦的，在反右运动中犯严重错误也是错不可恕的。在这些比我更老的差质生面前，我似乎产生了虚幻的优质生的良好感觉。其实，我在优质生的眼里，离右派也不过五十步路，与陶德坚差不了多少。由我这样的差质生坚决打压陶德坚这样的差质生，看上去既悲哀，又滑稽可笑。

我粗略看过陶德坚写的自传《风雨人生》。她在反右时因为在鸣放会上代表几个人提了一点很轻微的意见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此后虽然还是党员，政治地位已一落千丈。她积极参加文革，又受到很大冲击，特别是受到414的极大打压。此后她的人生之路一直坎坷，甚至无法在清华立足。但她一再表示相信党、忠于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从她不平坦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其中有一些像是我的影子。今天看来，她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我为曾经伤害过她感到不安和内疚。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向党猖狂进攻的恶魔，是人民的死敌，因而我对他们无比的痛恨。这当然是党长期灌输教育的结果。今天重新审视，事实上，这是一群听从党要开门整风的号召，出于热爱党、相信党，对党提了些意见、建议、批评的人。党把这些用“阳谋”引出的“蛇”统统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执政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几十年后，为了掩盖错误，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以证明仅仅是犯了一点扩大化的过失。一个政治运动，把99.99%的不是右派的人都被“扩大化”成右派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可笑的狡辩吗？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绝大多数右派已经摘帽了，但不是平反，好像右派分子还是有罪的，只不过是该戴上右派的帽子。这让我联想起蒯大富尽管由周恩来亲自平反了，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是“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东西”，很是相像。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这批被错整的右派分子，总体而言，比当时的大多数人更能独立思考，更敢于讲真话，更有批判精神，以及更强的公民意识。他们是一批正直、真诚、勇敢、有良知的中国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是无辜的，无错，更无罪，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

右派分子是在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痞子”，是一批新社会的贱民。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状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人间悲剧！

第十二节 “揪刘火线”，闹哄哄的政治庙会

1967年7月初，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的市中心，在被赭红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南海，在面对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

始作俑者是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

1966年8月3日，刘少奇与他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八一团”代表谈过话。刘少奇被打倒以后，这谈话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证”。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一直要求刘少奇做检查。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刘少奇不得不在1967年7月8日写了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问题是，新八一团”是从老“八一团”分裂出来的。刘少奇的检查只向新“八一团”做，老“八一团”怎肯罢休？于是，7月9日，老“八一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刘少奇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向“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但是，刘少奇无论做多么深刻的检查，上面的中央文革，下面的造反派都不会饶过他的。他的检查被批判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新一轮“革命大批判”的“反面教材”。可能刘少奇根本就搞不清新老“八一团”之间有什么差别，他的检查书只写给新“八一团”又落下一个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罪名。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团”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

这消息一传开，很快引起北京各大中学、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仿效。一些造反派赶去声援，划地为营，竖旗为寨。短短几天功夫，各色人等赶往府右街“参观”，热闹非凡。

这就是初成气候的“揪刘火线”。

几天后，刘少奇的检查传到清华。团派闻风而动，于14日进城示威游行，反击刘少奇的新反扑。414消息滞后，行动迟缓，群众不满，总部被动。

沈如槐对我说，既然已经被动了，就不要着急，跟在团派屁股后面跑永远都被动，还是等一等，看准了时机再行动。

当我们得知建工老“八一”在中南海西门的静坐示威得到中央首长的肯定时，18日晚，总部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参加“揪刘火线”，既是抓住大方向，又能改善414以往在人们中的右倾形象，同时也有别于团派的进城游行。于是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召开声讨刘少奇的誓师大会，下午进城游行，晚上进驻中南海西门。任命刘万章为总指挥，蒋南峰为副手，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几乎在同一时刻，团总部也作出了相类似的决议。

19日，414与团派两支路线相同、规模相仿、目的地一致的游行队伍前后出发。团派手握全校的资源，先遣部队乘着四个轱辘的汽车飞速前往。414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徒步或骑自行车前往，很有点“土八路”与“国军”赛跑的架势。巧的很，那天正好有一支机械系的414小分队在城里活动。他们自作主张地打着414大旗去了中南海西门，所以比团派的大部队早到了片刻。这着实让414自我陶醉了一阵子。

清华两派没去之前，驻扎在“揪刘火线”的造反派队伍不过二三十家。团派到西门以后，联合北航“红旗”，召开了很有声势的誓师大会，蒯大富代表两校发言。晚上，414联合新人大、林院等单位，发起成立了“揪刘火线联络站”，并组织了有五千余人参加的声势更为浩大的誓师大会。

清华两派的同时出动产生了极大的带动效应。各路造反派争先恐后，纷纷跟进。以后短短几天功夫，进驻的造反派达到近一千家。顿时，府右街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旌旗招展，喇叭震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层层叠叠，连营结寨十几里，棚子搭起七千多。即使是天桥庙会，也没有这样的闹猛。

刘少奇在围墙里被中南海里的造反派揪斗，拳脚相加，脸青鼻肿，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围墙外“打倒刘少奇”的呐喊声。

在那一段时间里，校内的运动已经不是中心了，两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揪刘火线”上去了。

在“揪刘火线”的现场要经常开大批判会。总部交给我的工作是组织大批判稿件。那时校内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多得是，组织几篇稿子不成问题。说实话，在乱哄哄熙攘攘的露天开大批判会的场合，并不要求批判稿有多高的水平，因为谁也没在那里认真听，只要能造出声势来，标语口号式的，套话官话废话的，都一样管用。

“揪刘火线”本是批判刘少奇的战场。中央文革本来也希望通过共同对敌，促进两派的大联合。但是，很快地，对敌阵地变成了两派内斗的战场。不仅清华两派如此，许多单位也是这样。那时已经有天派地派之分了，整个“揪刘火线”形成天地派两大阵营，活动有各自的联络站在组织。各个造反派嘴里喊着“打倒刘少奇”，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对立派的气势压下去。互相冲击批判会场的有之，高音喇叭对骂的有之。在中南海里能听到这些的刘少奇本来应该有一丝窃喜的心情。可惜，他过的是度日如年的难熬日子。

我到“揪刘火线”也去过几次。既是为了感受现场的革命气氛，也是看看414做得怎么样，还需要做点什么。由于414进驻的时间比较早，414的指挥部设在府右街旁的丰盛小学里，在府右街上还划了一块十几平米的地盘作为前线阵地。

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闹得交通堵塞，鸡犬不宁，并有向北门、南门蔓延之势。本来想集中矛头对准刘少奇的，没想到，倒是引发了两派更多的内斗。中央文革为如何收场而煞费苦心。正好，快要到8月5日了，那是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纪念大会，然后要求各个造反派在会后都从“揪刘火线”体面地撤回去。

上天安门城楼的票，“揪刘火线联络站”也分到二张。照理说，414是联络站的发起单位，是应该分到一张票的。但是自北师大加入联络站以后，以谭厚兰的名头，处处排挤414，力图主宰联络站，引起我们极大的不满。这次分票，北师大暗中搞鬼，414一张都没分到。沈如槐要蒋南峰无论如何也要弄一张来。蒋南峰以联络站召集人名义重新开会表决，终于争得了极其宝贵的一张票。

当蒋南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先明确表态，应该是沈如槐上天安门城楼的。沈如槐谦让说，还是你老孙去吧！蒋南峰开玩笑地说：“这票是我抢来的，你沈如槐不上，那就我上了！”说心里话，我内心是特别想要这张票的。那个时候上过天安门城楼的清华学生，除了

蒯大富，屈指也没几个人了。更何况，还能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是一份多么无尚的幸福和荣耀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代表414去的。只有一把手才有这个资格，我是不能有这份妄念的。

1967年8月5日，在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庆祝毛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天安门集会上，沈如槐代表414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瞅准时机把414袖章送给了周恩来，还与他谈了几句话。蒯大富上天安门，对团派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新鲜和刺激。沈如槐上天安门，对414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份自我陶醉，团派要是见了，准会撇撇嘴的。

大会以后，各造反派纷纷拔寨回府，历时近一个月的这场闹剧终于收场。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难忘岁月】

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上）  
——读《良知的拷问》之后的一次谈话

• 孙 耘 •

Y —— 一位关心、熟悉清华的朋友  
S —— 孙耘

Y：你读了孙怒涛的新作，为什么也想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心路？

S：2012年春天收到孙怒涛学长的回忆录文稿：《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题目开宗明义，作为文革当事人的反思/回忆录，这样立题的不多，在我们清华还是头一位。我作为同辈人，深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痛苦和艰难”，所以格外钦佩他的坦诚、勇气和执着。

当年，孙怒涛是414的头头，我是团派的干将。同为青年学生，大家的心路有相近之处；作为不同的个体，特别是处于对立的群体之中，又必有一定差异。我愿扼要地说说自己的经历和心路，顺便提及文革反思中一些问题和我的粗浅认识，作为对孙怒涛同学的一个回应，同时就教于清华学友以及关注、研究文革的朋友们。

Y：那么，就像孙怒涛一样，先从你自己小学中学的经历说起吧。

S：我家祖上是天津南郊的农民。爷爷开过米店，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能写一笔好字，但没接受多少新文化。他很早就到商铺“学生意”，后来在英美烟草公司谋到一份的工作，应属于高级职员。父亲言语不多，脾气暴躁，但待人宽厚、仁义，在外处世很谨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平安无事。他常以此自诩。这样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的潜在影响很大。我1950年上小学，属于最早那一批完全在新中国受教育的学生。那年我5岁，年龄小，懵懵懂懂的，一直是大同学的跟屁虫，从没有当过什么少先队和班干部。毕业时以第十来名的成绩混了个保送名额，得以进入天津十六中，就是著名的耀华中学。到耀华上初中，才是自我觉醒的开始。

Y：我知道耀华是天津的名校。怎么说到耀华才“自我觉醒”呢？

S：耀华学校始建于30年代，坐落于天津英租界，按国际名校的标准设计，有独立的体育馆、图书馆、礼堂和专门的讲演室、实验室等，在国内鲜见。

耀华的校名取“光耀中华”之意，代表了那一代有识之士教育救国的理念。解放后由私立改为公立，更名为“十六中”，普通市民子弟就多了起来。

十六中继承了耀华的传统，比如男女生合校不合班，我们1956级还试行按年龄分班，我们班大多是十一二岁的鸡和猴。入学时，我属于年岁小不谙世事平平常常的一介白丁，在玩玩闹闹中一个学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期末开班会，班主任颜老师总结说：我们班考试成绩在全年级最好，还有一位同学得了全五分……。我心里思忖着：谁能考得这么好？轮到我上前领成绩单时，颜老师小声对我说：还要继续努力啊。我听了心里直打鼓：没觉得考砸了呀？回座位上打开成绩单一看，呀，整整齐齐从上到下，全都是5分。这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一刻，11岁的我仿佛一下子觉醒了，逃离了浑浑噩噩的状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能行，你会做得更好。

小时候我除了上学读书以外，不大懂人情世故，更不用说社会政治，属于后知后觉者。初一下学期反右运动开始，我家没有右派，也不知道亲戚、老师或同学家长中谁是右派，对反右没什么概念。教历史的徐振树老师讲课很精彩，威信高。同学们听说他要“下放”劳动，就凑钱给他买点东西表表心意。代数李老师在课堂上得知后厉声责问班长：是谁的主意？大家见势不好齐声回答：是大伙儿的主意。后来学校还算开明，并没有为难我们这些小顽童，同意买些草帽、风镜、手巾等给徐振树和傅义柱（图画）几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右派。

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我开始在各方面展现自己。1958年“大跃进”，全校停课大炼钢铁。不知哪位同学搞到一个小高炉，要用大平板车去拉回来。没有骡马，谁来驾辕？情急之中我自告奋勇充当辕马，心想无非是利用杠杆原理找准平衡位置就行。化铁炉子两高三四百公斤重，十几个同学前拉后推，我紧握车辕保持平衡，一刻也不敢松手，任凭脸上的汗水流淌，只能靠同学给我擦去。小高炉大出风头，熔化出全校第一滴铁水，获得广播表扬。这件小事提高了我的威信，让我萌生一种自豪感，增强了自信心。从此，勇于任事、敢为人先逐渐成为我做人的风格。

Y：中学时代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呢？

S：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第一，耀华和清华一样，倡导今天所谓的素质教育，十分重视体育、文艺等业余活动，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兴趣小组。当年国防体育很兴盛，耀华的航（空）模（型）小组最出名，培养出多名运动健将，一位同学还成为我国航模运动的带头人。1958年兴起无线电报务运动，沈忠如、贾云年等高年级学生被选去集训，参加全国比赛获得优异成绩。报务组出了名，我一上高中就报名参加。1960年沈忠如报考清华无线电系，但录取时被调整至电机系，因为他出身资本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知家庭出身的影响。上清华以后，我到无线电运动队继续从事报务、测向等国防体育项目，在队里结识了我的爱人孙铮，后来在文革中的活动也多与清华体育代表队有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参加报务活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其二，我自小求知欲很强，喜爱读书，家里缺乏读书的条件和氛围，上中学后就常跑图书馆，凭兴趣乱看。有一段时间钟爱翻译作品，特别是苏维埃文学，西方古典名著也有涉猎，但兴趣不很大。我们自己的大部头革命作品几乎都读遍。这些作品大多把革命与战争描写得动人心弦，使青春期的我特别崇尚革命英雄，常常被那些英雄的高尚行为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常背诵保尔·柯察金那段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幻想着浪漫的革命历程，甚至惋惜自己出生太晚，没有赶上那火红的革命年代。这种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隐藏在内心深处，尽管是幼稚的、虚幻的，却不能否认它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在看来，它是促使我义无反顾地投身文革大潮的内在动因之一。

Y：这么说，你在中学里如鱼得水，成长得很顺利啊。

S：也不尽然。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我的父亲在1960年秋病逝，家庭的顶梁柱忽然坍塌，生活陷入困境。母亲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家庭妇女，哥哥中专刚毕业在外地工作，下边还

有三个小妹妹，十五六岁的我必须有所担当，为母亲分忧。当时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内外交困的生活让我实实在在体验了挨饿的感觉。城市里槐树柳树叶子都被扒光，近郊根本挖不到野菜，母亲因劳累与饥饿患了浮肿病。总之，那是生活对我的第一次磨练。

有一天，母亲拿出几张印制花哨的纸张给我看，原来是股票，要我到大丰面粉厂去领股息。这时我才知道家里还有股票，尽管每次才领20多元，根本解决不了生活的困难，但领股息就要算资产阶级。这可是件大事，不能对组织隐瞒，我当即向班主任如实汇报。以前，各类登记表“出身”一栏我都填“职员”，现在得改为“高级职员”，因为你肯定收入不菲。再后来，为表示对家庭认识的提高，就干脆写“资产阶级”，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出身的帽子。从此以后，我感受到家庭出身带来的压力，背上了这个无形的沉重包袱。

中学时代，我待人谦和，乐于助人，在同学中享有一定威信。我遵章守纪，成绩优秀，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但我从来没有“红”过，似乎总摆不正“红专关系”。高三那年，我和几位课代表一起费尽心力帮助大家复习功课，搞讲座、办墙报，晚间还到同学家个别辅导，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仍然入不了共青团，因为不够靠拢组织，我也不知道怎样才算“靠拢组织”。唯一的安慰是同学们选我作为群众代表、参加天津市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怀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告别母校，有自豪感也有压抑感，有甜蜜也有些苦涩。

Y：家庭出身好像并没有影响你上大学。

S：我的出身还不算正牌“黑五类”，至多是深灰色吧。我能上清华确实是命运的眷顾。1962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弦暂时松弛了一下，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之相应，当年的高考录取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强调考试成绩，要“按分排队，分级录取”，相对弱化了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我很想报考哈军工，但政治条件不合格。为了不花钱吃饭，我又想报考师范大学。学校老师们不甘心，一再动员我报清华北大，并亲临我家与母亲面商解决困难的办法。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上不了清华，我十分感谢他们。

Y：听说你当年是天津的高考状元？

S：这是民间的说法。那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十六中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的消息是阅卷的校友传出来的。当时虽然注重考分，但主旨仍是“又红又专”，所以高考分数及成绩排队严格保密，官方校方都不作宣传。到清华后，按照惯例我和十几名高分新生一起受到“蒋校长接见”。遗憾的是，我至今不知道自己确切的高考成绩。“状元”的名号增强了我的自信，也让我感到压力。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能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继续努力，要有所作为。

我们那届高考成绩很好，高分生多，录取率达93%，为母校耀华争了光。我听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曾接连一星期到耀华听课，继而多位老教师获得晋升，还传出要把耀华改为“国立二中”的消息。所以老师们对62届毕业生记忆犹深。

1987年正月初二，耀华传统的校友返校日，文革后我第一次回母校，见到阎治身校长。他教过我们物理，一见面就认出我，劈头一句：你们62届学生300多人，我从头想到尾，怎么也不会想到是你在文革中栽了大跟头。是啊，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温文尔雅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怎么会狂热地投身文革铸成大错呢？这些年我不断回顾自己的心路，一直试图做出真诚的、令自己信服的回答。

1962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回潮”，但没能掀起多大浪花，不久就开始了四清、五反，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4、1965届高中毕业生中，不知有多少“黑五类”子弟被阻断了进大学的道路。我和孙怒涛出身不同，不在同一年参加高考，现在却有着同样的感受：考上清华绝非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文革中我们团派认为教育界是“黑线主导”，批判过1962年的“资本主义回潮”。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回潮，团派中许多人很可能进不了清华，甚至上不成大学。文革中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悖论，我们自己往往深陷其中，应当引起深思。

Y：到清华以后怎么样呢？

S：初到清华，一切都感到新鲜，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典雅庄重的图书馆，金光闪闪的圆顶大礼堂，大草坪前镌刻着“行胜于言”四字格言的日晷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至于那些党团干部更处处显出高人一等的水平。与他们相比我自愧不如，感受到新的压力。

对我来说，初到清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吃饭。老师帮我申请助学金，很快拿到12.5元的全额伙食补助，我没有额外的4元生活补助，只能依靠自己的节俭和哥哥的补贴。解决了吃饭问题，我能安心读书了。为此我感谢清华，感谢国家，我要尽自己的力量报效祖国。

我们无线电系803班大多数是团员。一年级班主任顾璠文老师帮我圆了多年的团员梦。二年级我转到校无线电队。清华体育代表队有自己的党团组织，独立的宿舍和食堂，而且伙食标准更高些，对我这穷学生的身体发育大有好处。

Y：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是清华的特色，培养出不少“双肩挑”干部。

S：是的，后来许多人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当年体育代表队党团员的比例要高于普通学生班，学习成绩也略好一些。我所在的航海无线电支部政治气氛很浓，人人积极要求进步。我很自然地成为团干部“做工作”的对象，他们总要帮助我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我对那种居高临下充满说教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来越厌烦，甚至反感。

压抑和反感都属于青春期的内心悸动，同时也表明我对社会政治的一无所知。有一个例子，直到大学二年级，我仍然与一名乌克兰女学生保持着通信联系。那时中苏两党关系已公开破裂，厚厚的花里胡哨的苏联来信十分招眼，我却浑然不觉，最后还是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找我谈话，不让我回信了。现在想来很幼稚可笑，我那时对政治就是如此迟钝。

Y：我想，大学几年里你对政治的认识应该有所提高了。

S：那当然，我也在逐年长大嘛。对我们这一代同学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清华的反右教育搞得很热闹，有展览，有讲座，有座谈。我对反右了解很少，看了图文并茂的展览，觉得很新鲜。有一幅“群丑图”印象最深，教物理的何成钧教授打着阳伞蹲在阴影里，口称：毛主席的阳光没有照到清华园。细细品读后才明白，原来不能随意给党员、党支部提意见，搞得不好就是反校党委，反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我还得知，我们系的元老孟昭英、常迥，教物理的夏学江，教电工的杨福生诸位先生都是右派。他们工作认真，学问人品都无可挑剔，也不像不可救药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团委副书记谭浩强给我们年级作反右讲座，介绍他作为学生会主席如何挺身而出与来煽风点火的北大右派学生辩论。原来，清华这一茬年轻有为的中层干部，都是反右时知名的“左派”。我头脑中留下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印痕：要事事紧跟校党委，争取当左派，千万不要成为右派。

1964年开始的“九评学习”更加有声有色，“新清华”报、大会、广播一起登场，众多积极分子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孙怒涛对此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生动的描述，我们都有相似的切身体会。党团干部、辅导员们苦口婆心地鼓动我们“暴露思想”，你暴露的问题越尖端，就越显得积极，他们的工作成绩也就越大。我倒是诚惶诚恐地想表现一下，无奈自己的阅历简单，没有什么可暴露的亮点，只好再拿家庭出身说事。我检查自己对家庭认识批判得不够，检查自己受家庭出身的影响，遇事甘当老好人，明哲保身，缺乏斗争性等。我不属于组织上重点关注的人，稀里糊涂也就过关了。

Y：影响深远的反右教育和九评学习很有清华特色。你今天怎么看？

S：文革前清华的这两场思想教育运动是蒋南翔校长应对时局的一着妙棋。当年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上层建筑领域首先拿文化界开刀，继而派工作组进北大，波及到教育界。蒋校长政治嗅觉敏锐，未雨绸缪，一方面紧跟党中央，拿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尽全力强化“不漏气的发动机”，巩固清华的阵地。反右教育明确地告诉全校师生员工：谁反对校党委谁就是右派。九评学习的“清理思想”无疑是引蛇出洞的翻版。白纸黑字装进“袋子”，立此存照，以备秋后算账。我们班一位湖南籍地主出身的同学就在辅导员的

反复动员下，暴露了所谓反动思想，其实就是听老一辈说到毛泽东年轻时的轶事，四年后毕业时遭受批判，被工宣队发配到新疆。我党传统的驾驭知识分子招法在清华被发扬光大，而且运用得更为精妙。与此同时，校党委加紧发展学生党员，培养了从辅导员到中层干部一大批独具清华特色的双肩挑干部，指望他们确保发动机不漏气。

Y：蒋南翔是新中国的教育家，在清华学子中享有很高威望。你怎么看文革前蒋南翔主政清华的十几年？

S：确切地说，蒋南翔是共产党的教育家，身上兼具党性和教育家的属性。作为教育家，他继承了清华的某些优良传统，经过对全盘学苏的扬弃，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清华有人专门总结“蒋南翔教育思想”，自有详尽的论述。我作为当年的学生有些亲身体会，比如坚持全面发展，提出“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既注重基础理论，又强调动手能力；注意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等等。在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强调“重在表现”，敢于录取一些“有问题”的学生，既使对“反动学生”还坚持在校内教育、挽救。应该说，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能尽力坚持有教无类的传统是难能可贵的，我自己也算一个受益者。蒋南翔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通俗的说法就是“听话、出活”。校党委要求我们：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作驯服工具还要奋发有为；即使你奋发有为，也要当驯服工具，真是一个最具清华特色的口号。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早已弃如敝屣，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无可否认，就清华的整个历史来看，这是个明显的退步。作为教育家的蒋南翔没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另一方面，蒋南翔又是我党在教育战线的领头人，党性原则必定置于首位。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蒋南翔深谙党内斗争的真谛，从1952年院系调整入主清华，改“教授治校”为党管学校，借助反右等政治运动排除异己，培养嫡系，组建自己的清华牌干部队伍。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地打造了清华的“不漏气的发动机”。在政治风云中，蒋校长坚守自己的原则，特立独行，文革中拒不认错等，都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他本人锱铢必较、党同伐异的思想作风亦深深影响了清华的党风校风。改革开放后清华迟迟不给钱伟长右派改正，可作为一个注脚。

如唐伟同学指出的，蒋南翔进而推行“党化教育”，把清华办成党校。1953年他在清华率先建立辅导员制度，注重发展学生党员，悄悄地也十分有远见地把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作为目标并付诸行动。到文革前，在校学生党员达千余名，在高校中无出其右。正是这些辅导员和学生党员最终成为“大清帝国”的顶梁柱，实现了蒋校长出将入相的梦想。“满清政府”诠释了蒋南翔党化教育的成功。然而，党化教育禁锢思想，辅导员制度培养新型官僚，“南翔思想”指导下的清华党委一脉相承影响至今，半个多世纪出不来大师的清华屡遭社会诟病。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众多老校友扼腕叹息，为清华的前景忧心。

改革开放中许多清华学子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有其历史的必然，其积极意义是肯定无疑的。数百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多名常委，直到朱学长、胡学长，曾令我们无比自豪。几年前一位北大同学抱怨：台上都是你们清华学工的人，这是最糟糕的事。我当时据理力辩，觉得他们有酸葡萄心理。今天回头再看，人家说的难道全无道理吗？如今胡学长已突破旧规裸退，习学弟以亲民姿态接班，清华人继续执掌着中华巨轮。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条巨轮将被引导向何方？总之，关于清华和蒋南翔，一切的一切，是耶非耶，尚需人们思考，尚待历史验证。

Y：咱们继续往下谈。1965年你去四清了？

S：清华四、五、六年级学生从1965年暑假开始陆续进驻北京郊区农村。出发前对我们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刚刚发表的“二十三条”，其中一个新提法特别令人瞩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们第一次听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鲜名词。我们上故宫午门参观北京市四清展览，那还是按“前十条”和“后十条”精神搞的，介绍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闻所未闻，感到新鲜和刺激，心中充满了期待。

体育代表队与文艺社团到京郊延庆县，刘冰、何东昌亲自带队。我在城关镇胜利街大队，身着清华学生的标志装——空军的黄棉袄蓝棉裤，负责青年、民兵等工作。第一次长期在农村

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切感受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刚到农村吃“派饭”时，穷苦人家落满苍蝇的窝头和臭烘烘的腌咸菜难以下咽，后来居然吃得喷香；遇到富裕中农家庭用蛋肉招待，则一筷子也不动。我觉得自己在思想改造方面有了不少进步。

四清是我第一次直接参加农村的政治运动，头脑中留下几个深刻印象。第一，农民很穷，即使在延庆县城，许多农民辛劳一年，结算下来勉强能够购买分配的口粮和一点冬储大白菜，还有不少欠生产队钱的。为准备派饭，老乡们常拿一只鸡蛋换回一点酱油醋，调调口味。其二，地主富农与我们的想象很不一样。戴帽地主黎玉才解放时不过二十来岁，温文尔雅，没有什么劣迹。那些十几岁的地富子女聪明能干，但地位卑微，虽然表现积极，却难掩内心深处的痛楚，令人同情。我不知他们以后走过什么样的生活道路，相信他们摆脱了出身的枷锁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能有所作为。其三，老贫农谈起本村出去的某公社干部，从小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土改时却特别积极，带头斗地主挖浮财，然后就入党做官，当上某公社书记。我从中知道革命不那么高尚纯粹，革命运动中常常靠痞子，即勇敢分子打头阵。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加，知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至今社会上流行的痞气和流氓作风是有其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

Y：1966年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继批判“海瑞罢官”以后，又批三家村，矛头已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你们在北京搞四清，有什么感受？

S：我和先知先觉的同学不同，根本不懂政治，对上层斗争毫无概念。四清时一直窝在乡下，春节都在延庆留守，所以不知道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1日北大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即一连串重磅新闻陆续传到四清工作队：北大闹翻天了，派去了工作组；彭真倒台了；学校有人给蒋校长贴大字报了……听到这些片断消息我感到惶惑和不可思议，大家都没心思工作了。没过几天工作组进清华，要求四清工作队马上封存文档材料，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结束了。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新的运动终结前一个运动似乎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态。

Y：档案记载，工作组6月9日进清华。你们哪天返校的？

S：参照孙维藩日记，应在6月13日前后，浩浩荡荡一连串斯柯达大轿车从延庆拉我们返校。一路上带队干部们明显心绪不佳，政治敏锐的同学开始指责他们，要求他们与校党委划清界限。一进校门，就看见乱哄哄一群学生，拥簇着一位戴纸糊高帽手敲脸盆的年轻老师游街，宿舍门口墙上满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我从未见过这种景象，起初感到惶恐、吃惊、不解，当发现自己不属于运动对象以后，又想看看热闹，继而就去凑这个热闹，要表现自己的积极参与。我当天就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沈×，你保谁的驾？”，要我们队团支部的沈同学与蒋黑帮划清界限。

我很想多写几张大字报。辅导员韩洪樵老师是三字班海军调干学生，为人厚道，我说不出什么意见。对蒋校长和校党委也不知道该批判些什么。怎么才算积极参加运动呢？反正墙倒众人推，我抱着一种玩闹心态，回到无线电系班上写了一篇大字报，点名批判教研室主任扬弃疾先生。三年级时杨先生主讲超高频技术，开场白谈治学方法引用三句古训：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温故而知新。这都是金玉之言，我却耍小聪明对杨先生无限上纲：学而不思则罔，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不是反对“立竿见影”学毛主席著作？我那时还不懂得，这顶大帽子能有多重的份量。文革中我与杨先生再没有接触，不知道这篇大字报对他有过什么影响。多年后听到杨先生的一些事，知道他是一位很有独立见解的正直的学者。后来我们年级几次返校聚会，杨先生因年事已高都没有参加。我与先生不熟悉，没有勇气直面先生道歉，就借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歉意吧。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mailto: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